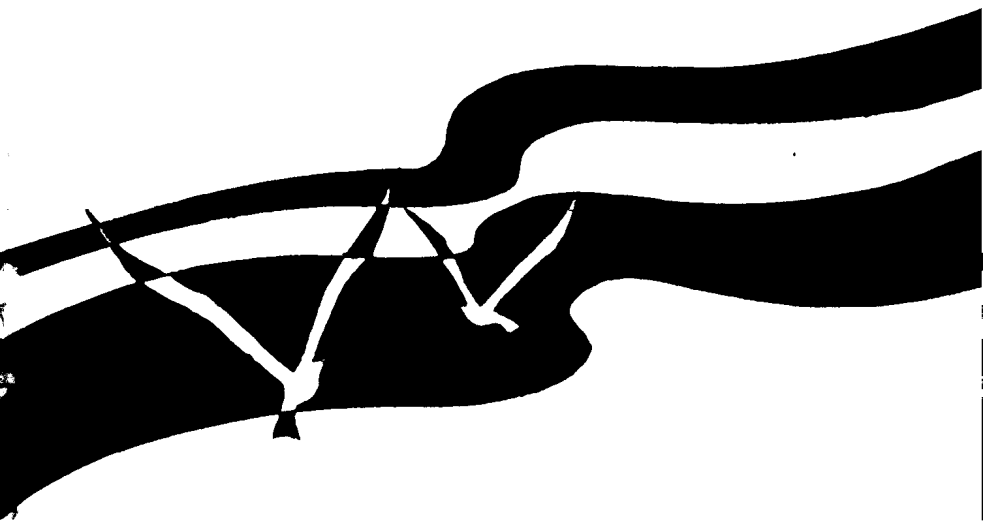




艾芜

谈小说创作

湖南人民出版社



艾 芜

谈 小 说 创 作

汪华藻选编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谈小说创作

艾 芜

汪华藻 选编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9,000 印张：6 印数：1——19,000

统一书号：10109·1681 定价：0.56元

出版说明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当前，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作家谈创作》小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每位作家编选一册。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文章形式不拘，有漫谈、随笔、书信等，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1
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28
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	34
《艾芜短篇小说集》序	43
关于创作的几个问题	46
创作漫谈	68
如何反映矛盾冲突和加强基本功	73
生活·人物·故事	79
谈短篇小说	98
练习写小说先从哪里开始	106
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	113
略谈学习、锻炼和创作	122
文艺与生活	125
生活基地的深入和扩大	130

给《边疆文艺》编辑部的信	132
《故乡》里面的语言	135
鲁迅先生的小说	142
关于鲁迅先生的小说	152
鲁迅先生的小说与时代	158
怎样学习鲁迅的小说	164
描写光明和黑暗的一例	168
阿Q和关羽	172
略谈果戈理描写人物	176
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181
高尔基的小说	185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讲的第一点：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也就是我怎样有了生活的积累，怎样学习了一些写作技术走上文学道路的。我的家庭是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祖父是教私塾的，家里生活并不好，但因他们在教书，也带着我读上了书。当时读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新式教科书，是我父亲教的；那些四书五经，是我祖父教的。这些课程，我都很热心地学习它；在课外，又读了一些小说。我有个堂叔父，他家里有几十、上百种各种各样的小说。开头，他讲故事给我听，后来，他说：“算了，我讲也难讲，你拿去看吧！”于是，我就拿了一些书来看，有侠义小说，〈七侠五义〉（又叫〈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这些侠义小说读了很多。其次是公案小说，如〈彭公案〉呀，〈施公案〉呀，〈济公传〉呀，这类小说也读了不少。第三

是演义体的小说，《西汉演义》、《东汉演义》、《说唐演义》、《东周列国》等。就这样把我吸引进去，很喜欢在课外读这些小说。但这些小说都不是第一流的，象《水浒传》、《红楼梦》等当时就没有读到。于是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读书。那时候，学校里教文言文，要求学生用心读到背得，要求用文言文来写作文。我记得，初级小学三年级毕业，我已经把文言文写作文这一关过了，能用文言文写一二百字的文章，写得通通顺顺。做到了这一点，后来，用白话来写作就更容易了。我那样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父亲都不主张我再读书，他们说，读完初小四年级就可以了，不是文盲也就行了。但是，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因为我喜爱读书，一心希望能够继续上学读书，可是家里没有那么些钱，不能继续供给我。我是四川新繁县人（现在新繁合并新都县，离成都五十里）。就在那一年省上一个叫做万成明的省视学到我们县上来，全县举行一次观摩会，把全县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的学生都集中起来考国文。他出的题目是《观摩会记》，我写了二三百字文言文的作文。当时很多小学生文言文没有过关，所以他们就考得差。我考第一名，还得了奖品，家里很高兴。我说，我再去读书行不行？家里也认为可以再让我去读书了。那时县上还没有中学，只有个三年毕业的高等小学堂，我一去就考上了。

进学校以后，我又把学校图书馆的书都找来看，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论文的书最多，北京、上海等地出的新刊物，学校都订得有（我们那所学校的校长是吴虞的侄子，吴虞是什么人？是五四运动时候反对孔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人，也是鼓吹新思想最出力的人，胡适之称他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侄子就跟他走，所以订了很多外边的刊物）。许多新刊物我都拿来看了，耳目为之一新。因过去读的都是些剑侠小说，而现在读到的《新青年》、《新潮》都写现实社会中新的事情，这就使我对新的文学更加爱好啦。那个学校三年毕业，读了两年，我就把学校的书都读完了（当然线装书还有很多，我也没有去读，新小说、杂志都读完了）。还有一年才毕业，我又报考了成都联合中学（现在成都第四中学），一考就考上了。我很高兴，回家对父亲说我要出去读中学。父亲说：“你去问一问，一年要多少学费？多少伙食费？”我到学校去问了，一年要九十元，包括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而我父亲一年的工资才八十元，就是全家不吃饭，完全供我读书也还要欠十元。这哪能行呢？我那时，是小孩子的心情，不体谅家里的苦处，不管家里有没有钱，就是要读书；不让我读书，甚至想到要自杀。我走到池塘边上去，池塘边栽了很多柳树、果树，风景很美丽。我那时就喜欢读描写风景的诗，在座的同志还可以找五

四时候的杂志来翻翻看，那上面有黄仲苏写的诗，写得很美丽，多数是描写风景。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康白情，他写《草儿》的诗也很好，那时我们都爱读他的诗。这些描写风景的诗增进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站在池塘边，看看想想，风景那么美，人生还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于是又不想自杀了。我又回去，在县城的小学读了半年。还没有毕业我就去投考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真的考上了，考取五十名学生中，有四十名是高等小学毕了业的，有十名是没有毕业的，我恰恰是十名内的一名。在学校里，我对化学、物理、代数、植物等都很有兴趣。同时在课外还借了很多书来看：如林琴南翻译的文言小说，就是把狄更斯的小说（现在叫《雾都孤儿》，那时候叫《贼史》，就是强盗的历史）翻成古文的；另一本现在叫《艾凡赫》，过去叫《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些文言文的小说，古文式的小说，也拿来读。这个时候正是一九二一年创造社办起了《创造月刊》、《创造周刊》、《创造季刊》，北京那边《语丝社》，上海《小说月报》也继续在出，这些期刊学校里都订得有，我们都去借来看。这些多半是课外读的，那个时候上课的课程要认真学好，课余才读文学书籍。

我当时几何、代数、植物、生物都很喜欢，我想将来进大学就要进数学系，不然就进生物系，我虽然爱好

文学，可是没有当作主要课程学习。喜欢读书的欲望从小时候就有了，越大越想读书，想读大学，目标就是北京大学。“五四”时，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长，陈独秀、胡适之都是北大的教授，所以“五四”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因此，我就是要到北京大学去读书。我有一个同学，是高我几班的，他就在北京读书，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北京半工半读，一方面做事，一方面到可以听课的学校去学习（那时候的学校开放，老师讲课外来的学生是可以去听的）。他写信给我说，要到北京读书每年要有三百块钱，没有三百块钱到北京来就要饿死，读不成，很危险。他劝我千急莫要去。我想这怎么办呢？书是不能不读的，读书可以使眼界扩大。那个时候有个勤工俭学，办法是到法国去半工半读。象陈毅副总理呀，邓小平副总理呀，他们都是去勤工俭学。但我们那儿消息闭塞，等知道了勤工俭学的消息，已经迟了，不再招生了，这个勤工俭学的门也就关了。后来有个人叫施存统，他们在上海办了个工读互助团，半天读书，半天工作，象印信笺、信封啦，洗衣服等好多工作。后来这个团体也失败了，真是使我感到走投无路了，到处都关门了。后来就想到南洋去，那个时候走南洋的华侨很多，有广东人，福建人，云南人，听说很多人去南洋都可以找到工作，找个工作很容易。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决心到南洋去。

可走哪条路呢？如果从上海走，成都到上海的船钱出不起；上海到新加坡这笔路费更是多得很，无法筹备。没得钱，我就决定走云南到缅甸这条路去。走这条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象在上海、北京天气寒冷，要穿棉衣；南洋气候热，只穿单衣就可以解决了，不需备什么棉衣棉裤，甚至可以不穿鞋子。一个人搞点体力劳动，光解决吃饭问题就容易了。又听到有人说，云南东部这条路强盗很多，有的人，你在路上看见他在割草，转过身就打你一扁担，拿走你的钱。这条路走不得。我就写信给一个在邮政局工作的同学，问他云南昆明到成都经过哪一条路线？他说经过云南东部。我想邮差都能走，为什么我不能走呢？我就下决心走。当时我就把这个主张提出来（成都有一个刊物，现在还在查，是法国留学生孙卓章办的，宣扬社会主义。我写信告诉他，我这个青年人不能在国内读书，想到南洋去半工半读）。有两位平时不熟识的同学知道这个消息，他们都愿意跟我走，于是决定三人一起走。

这里要补充一下，有人问：你要读书呵！当时成都第一师范五年毕业，一年预科，四年正科，才读了四年，还要一年——一九二六年夏天才毕业，为什么把剩下一年丢了？那是因为个人婚姻问题。“五四”时候反对文言文，反对旧式包办婚姻，我们年轻人就是要反对旧式

婚姻。我从小时候就订婚了，我对父亲讲，这婚姻要退掉，我认都认不得对方，将来怎么会有幸福？我父亲大发脾气，哪有退婚之理，非结婚不可。他说：“你哪年毕业，就哪年结婚。”我想，等到毕业再结婚。毕业后我又还要去读书，人走了，岂不害了人家吗？为了解除那个婚姻，所以我提前一年就走了。学校结业没有回家，留在成都，走时是从成都走的。那时省师第九班有个同学，他家在珙县，要回到云南边境上去，我就和他同路走。本来那两位同学要和我一起去南洋的，我们走时，他们没有来；到了筠连，他们没有赶到，中途回去了，最后，就剩我一个人。由昭通、东川，经寻甸到达昆明。到昆明时，一个钱也没有了，住在一个鸡毛店里，那时的云南，店子里一张床上只有一床铺盖，陌生人都睡在一起，我这篇《人生哲学的一课》写的就是到昆明的情形。我读不起大学，就把社会当作大学，这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流落在昆明街头，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我积累生活就这样开始。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没有钱，又不认识人，怎么生活下去？我就是积累这些生活的。在饥饿的时候，从玻璃窗里看到那些摆着的熟鸡、熟鸭、熟肉，只能隔着玻璃看，不能去吃。那个社会就是那样组织的，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这样的社会，我就是这样上了第一课，认识了那个社会。后来，我的生活确实

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就去卖几本旧书（顺便说一下，我出来时带一些什么书呢，我曾经想过，如果能进大学，就读物理系、数学系或生物系；不进大学就研究哲学。所以走时就带了胡适之写的《哲学史大纲》，带了梁漱溟写的《东西文化及哲学》。现在我才能说这个话，“四人帮”没有打倒时，胡适之的名字你提都不要提。梁漱溟是民主人士，唯心主义学者。还有马寅初的《经济讲演集》、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吴的书是站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立场上写的。我就带这些书出来，这些书都翻阅旧了）。我记得当时昆明文明街有个卖善书的书店“明善堂”，这个“明善堂”是全国性的，专门发行善书。这善书却没有人买，书摆得久了就旧了。我以为是开旧书店卖旧书的，就走进去。有位老先生，河南人口音，我问他收不收旧书？他说：“我们不收，你看，这都是些善书，是我们印出来卖的。”这老先生大约五十多岁，是个很善良的人，可惜我竟忘记了他的名字。我记得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卖书？”我说，我从四川来，带了一些书，生活无着，只好卖书。他不要书，送了我两角钱。我说，钱我不要，请你给我介绍个职业。他说：“好，我给你介绍个职业；钱你一定要收下，你几天都没吃饭了。”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一个红十字会，要雇用一个人。那时，昆明红十字会在看美

巷（这条巷子这一次来昆明我去看过，在翠湖边上洗马河那里，已经把名字改了，叫淆美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子。以前开过餐馆，叫肴美居；后来馆子停了，有一个姓杨的团长住在那里。红十字会会所就在旁边）。他带我去红十字会会所，问了情况，说可以接受。负责人说：“我们红十字会有个送诊处，有两个医生，上午就去送诊，没人挂号，你来帮着挂号；下午就跑街送信；早上起来，烧开水给外科医生用，还要扫地倒痰盂，整个会所里的杂役工作都要做。”我说我愿意做。我那时为什么乐意做，思想认识上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在来云南之前，从《新青年》上看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它叫劳农政府，就是苏俄。在那里，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这是鼓舞人心的一件大事情。第二，是我在《新青年》上看到蔡元培和李大钊发表的文章，鼓吹劳工神圣，赞美劳动。所以，我认识到，干任何下贱的体力劳动都是神圣的，都是光荣的劳动。这一点，在思想上解决了，所以，凡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我在那里写了一篇以红十字会做题材的小说《左手行礼的兵士》，一个兵士他不是右手行礼而是左手行礼。他右手负伤了，是龙云和胡子嘉两家打仗受了伤的兵，到红十字会来医，我是用这题材写的。关于红十字会，会所的所长姓何，大家可能知

道，那时昆明有个何干臣，和唐继尧、罗佩金都是军人。这个何干臣当时很有钱，昆明半个城房子都是他的，所以又为何半城。这红十字会会所是他的。红十字会前面是武庙街，后面是洗马河，他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家里有戏台可以唱戏。我把这个题材用来写《南行记》里的一篇小说，叫《赌子客店》。再印的时候就把它删去了一千字，增加四千字，把何半城这家的环境写入这篇小说里面。另外，又把我在昆明红十字会工作的情形，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我的青年时代》，同志们有的可能看过。这就是我在云南的情形。

我在云南还是想读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写新诗。一九二五年前后，云南有个刊物叫《云波》半月刊，纯文艺的刊物。茅盾同志有篇文章写到“《五四》时期的文艺刊物”也讲到过昆明出版的《云波》半月刊，我给《云波》投了一首诗，写翠湖边上的景色。这首诗，可以说是我写的文艺作品，第一次在刊物上登载。从我《人生哲学的一课》的取材，用来开始写作，和发表第一次写的诗，都是在昆明，所以我对昆明感到很亲切，感情上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教育和支持是很大的，所以我还是屡次想来云南（这一次是第三次了。第二次来云南是六一年冬天到六二年春天，到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州生活了半年）。那一次就发表了那首诗，其它的诗没有发表。《云波》负责

主编的一个人叫尹润甫，参加了黄埔军校，北伐的时候死在战场上，是一个烈士，所以他这一刊物没有办下去。

我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到昆明的，在昆明住了一年半，为什么能在这里住一年半，原因是我听说有个叫“白希文”的英国人，在云南菜市街办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英语。红十字会的负责人，那时他们给我的工资很低，十二块钱一个月，扣了十块钱的伙食，只剩下两块钱。这些我也不在意，只要求让我晚上到补习班补习英语。后来他们让我去了，第一天两个人同坐一张桌子，侧边的那个年轻人就是陆万美同志，他就是现在云南作家协会主席。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在那里读了很多的书。我们读英语也读文学书，他的功夫比我深。那时许多人去补习的目的在哪里呢？原来香港大学委托这个学校每年招考一名香港大学学生，这一名学生考取了，全部免费。所以云南好些青年、高中毕业学生晚上都来补习英语，准备考香港大学，当时陆万美和我也是这样想的：要补习好英语，准备考香港大学。我们那时英文、几何、代数都学习。但我去报名时却碰了钉子。学校说四川人不能考，只有云南人能考。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保送这个学生读书的钱是英美烟公司出的，公司原料全是云南的烟叶，用云南的原料在上海赚了大钱，对云南要